

近年来明清社会救济研究述评

黄兆宏 姚延玲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社会救济, 亦称社会救助, 它是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的援助, 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 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行为。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对这一时期救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总结, 对明清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明朝; 清朝; 社会救济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09)10-0035-06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事业也颇为关注, 特别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开展, 学界对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相关论著层出不穷, 成果颇丰。本文试图从总体评价、备荒仓储、赈济、社会慈善事业四个方面入手, 对近年来国内(不包括港台地区)学术界对明清社会救济的研究试做简单的回顾总结。

一、总体研究

孙绍聘《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对明清时期的救灾思想、救灾主体在救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局限性, 以及救灾信息、资金、物资在救灾资源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救助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一书, 在上编中对清代国家政府的社会救助活动、措施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下编则分析了封建国家作用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衰退以后, 民间、工商业领域等其他社会救助活动。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一书在第六章、第七章中对明清时期的慈善事业的发展 and 具体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分析论述, 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慈善救济系统。王子今等编著的《中国社会福利史》(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年版)对明清时期政府的福利政策和民间的福利组织进行了论述。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对明清时期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民间的慈善

事业进行了详细系统地论述。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四章、第五章对政府的救荒和民间救荒进行了论述, 分析了明朝政府在救荒过程中的行政能力和经济能力, 指出在万历以后政府的荒政能力逐渐减弱; 同时详细分析了民间救荒的具体形式和关于富民救荒思想的主张。唐力行、徐茂明《明清以来徽州和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江海学刊》, 2004 年第 3 期)一文中, 指出徽、苏两地虽同处江南, 社会保障虽皆以民间力量为主, 但由于自然人文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 其社会保障在形式、主体、宗旨和效果上各具特色。王卫平、黄鸿山、康丽跃《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专门探讨了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灾害救助、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等内容, 从政策性、制度性的角度研究了清代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关于仓储制度的研究

仓储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救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平仓、社仓、义仓等诸种仓储各司其职, 相互补充, 平日积粮, 在灾年通过赈济、借贷等方式救济灾民, 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备荒体系, 对保障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近年来的研究既有总体上的论述, 也有对某个区域或某种仓储形式的单个分析考察, 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化、细化。

(一)对仓储制度的总体论述: 崔赞的《明代的备荒仓储》(《北方论丛》, 2005 年第 5 期)一文简要论述了明代预备仓、济农仓、社仓等仓储的建立、管理及其在救荒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洪璞在《试论明代苏州地方仓廩的社会调控功能》(《中国农史》, 1997 年第 4 期)一文

中,运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从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机制的结构和调控效果等方面入手,对明代苏州地方的仓廩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论述,指出地方仓廩系统在维护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初步具备了社会调控的功能。汪火根《明代仓政和基层社会控制——以预备仓和社仓为例》一文(《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则以明代预备仓和社仓为切入点,分析了明代的备荒仓储制度,指出明前期以预备仓为主导,后期则是预备仓和社仓并存,而社仓则更显活力,这种变化反映出了官方和地方乡绅在基层社会控制上权力的消长。吴滔在《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从仓储的变迁历程、管理和运营等三个方面,揭示了仓储制度在这一特定区域中的具体落实情况,更进一步清晰地反映出了仓储制度的运作实态。而其《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社会职能探析》(《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一文则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明清时期常平仓、预备仓的经济职能,并指出随着官方预备仓、常平仓的衰落,社仓和义仓担负起了主要责任;系统阐述了仓储系统的社会职能即社会控制职能,指出无论是为了履行平糶、借贷还是履行赈济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救济职能,仓储系统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稳定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州县上的各类仓廩的贮粮来源、仓廩的兴建与管理、糶余办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地方仓廩的社会功能及其在清中期衰落的原因。王水乔《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则对云南的仓储制度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仓储主要来源于捐纳捐输、采买、租谷;在灾荒年月,仓储通过赈恤、平糶、借贷等手段在救济灾民、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者也指出,由于云南地区粮食短缺和仓储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弊病,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仓储制度的社会功效。同时还提出以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为标志,云南的仓储经历了发展和衰落两个时期。

(二)社仓: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探析》(《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等进行了探讨,同时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仓谷本不再由官府提供,而主要由民间自积,且范围扩大到了社内各户。吴洪琳《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清代陕西社仓的基本情况,指出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羨银采买,其分布和规模都比较大。

同时作者以陕北、陕南、关中三个不同的区域为考察对象,分析讨论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这三个地区社仓的发展及以后的衰落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黄鸿山、王卫平《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学海》,2004年第1期),对清代社仓的利弊及其兴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清代社仓的旋兴旋废,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仓制本身存在借还难、任人难、劝捐难等缺陷,而清朝后期吏治的腐败则加速了社仓的衰败。赵新安《雍正王朝的社仓建设》(《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一文通过利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史料,分析论述了雍正朝社仓建立的原因、发展过程、运营管理、存在的原因及其社会功效。

(三)义仓:黄鸿山、王卫平《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以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个案,剖析了义仓在近代化背景下其功能和管理方面的新发展。文章回顾了义仓制度的源流,论述了长元吴丰备义仓的创建演变、自身的经营与管理与当时的社会职能及其作用,在结论部分则分析了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发展变化与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理念的变化和原有仓储形式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关于赈济事业的研究

近年来明清赈济救荒史的研究与过去相比有了重大突破,传统的对国家荒政的研究依然继续,而更多的学者则把研究视角转移到了民间,弥补了对民间社会救济研究上的一些不足。同时,这一时期研究的区域色彩比较浓厚,许多学者结合某个特定的区域或以某个灾荒为个案,分析研究当时国家和社会采取的救济措施。

(一)荒政:周致远《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一文从朱元璋顺天应人的弭灾思想、体恤民瘼的救灾思想、务实杜虚的荒政风格等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其救荒思想和采取的具体荒政措施。叶依能《清代荒政述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一文从总体上论述了清代荒政的特点、救荒的措施,并对清代的救荒政策予以全面的评价。指出清代荒政有着历代王朝不可比的显著成效,但是自乾隆朝后期以后,随着吏治腐败、财政紧缺,使得荒政弊病不断,大大影响了救灾效果。倪玉平《试论清代的荒政》(《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对清代荒政中的赈灾制度和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清朝的荒政集历代之大成,颇有创新,在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和促进社会发

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7年第4期)以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为研究对象,分析论述了当时国家在灾荒赈济方面存在的弊端以及采取的整治工作。王卫平、顾国梅《林则徐的荒政思想与实践——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论述了林则徐的救荒思想及其在江苏任地方官时的筹谋救荒之策。陈桦《清代的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从政府政策措施的角度,对清代粮食储备、治河修塘、灭蝗捕蝗、信息奏报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勾勒出了清王朝防灾减灾活动的概貌及其特征。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域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对蝗灾下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治蝗过程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雍、乾年间,政府在治蝗过程中投入了较多力量,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到了后期随着吏治的腐败,控制力度相应减弱。

(二)粥厂:龚小峰《论明代的赈粥》(《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明代粥厂的施赈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的论述,使我们对明朝的粥厂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段自成、张运来《明后期煮赈浅谈》(《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对明代后期煮赈方式的变化、政府对煮赈过程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煮赈对当时社会稳定等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王林《清代粥厂述论》(《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一文则对清代粥厂的类型及施粥对象、粥厂的管理及经费来源、粥厂的利弊及其在救荒中的地位做了系统的论述。清代的粥厂大致有两种类型,即日常救济中的隆冬煮粥和灾后赈济的粥厂,其施粥对象以灾后垂死之民和流民为主,具有救死和防止灾民流动的双重功效;粥厂的开设和管理大致要经过报批、择地、发筹、领粥、稽查和弹压、安置或遣散等程序,其经费的来源既有官府的拨付,也有官员捐廉和绅商富户捐输及动用谷仓。

(三)蠲免: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的灾荒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明代万历时期灾荒蠲免的政策、蠲免的项目以及万历前后期灾蠲的变化及其原因。指出万历时期蠲免的主要特点是以田赋为主,改折其次,万历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困窘及明神宗对朝政采取消极的态度极大地限制了灾蠲政策的执行。商传《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明前期的三次蠲赈和减赋个案的研究,指出明初在处理灾害政策上的变化,即从以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

赋,渐变而成为普遍之减赋。指出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能力的下降和基层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明初伴随着国家总体政策由重赋向减轻赋税变化而引起应灾政策的变化。张杰的《清代康熙朝蠲免政策浅析》(《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一文把清代康熙朝的蠲免政策分为五个部分,即豁免捏垦的蠲荒政策、稳定民心的蠲灾政策、休养民力的蠲积欠政策、厚生裕民的恩蠲政策、藏富于民的普免政策,分析了其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

(四)宗族救济:李江、曹国庆《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中宗族义田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首先论述了明清时期全国宗族义田的发展情况,指出由于受南北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南方逾于北方;其次,通过宗族义田创建者身份的考察,指出每个宗族义田的建置,不论其规模大小、效果如何、大小怎样,都是兼职者的一种付出、一番心意,必须有一定的财力做基础;分析了在明清宗族义田大发展背后隐藏的社会原因;论述了宗族义田在养济族人、助学重教、助役应差、救荒赈灾、敬宗奉祀等方面的功能及明清时期宗族义田的发展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张翔凤《近代苏州碑刻中的乡绅自治与宗族保障》(《史林》,200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近代苏州碑刻史料的研究,论述了宗族保障基金的来源及其运作,指出宗族保障基金主要由官宦和乡绅捐助,其主要方式是设立义庄,义庄为宗族保障提供了最重要的基金,义庄的管理则充分利用了政府力量和传统的宗族血缘纽带。刘美新的《清代广东族田的作用及其社会影响》(《广东史志》,2000年第4期)一文主要论述了族田在完纳国课、祭祀祖先、赡养族人、帮助族人受教育、储粮备荒、兴办族中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族田作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有其自身的弊病。余新忠《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以苏州丰豫义庄为考察对象,通过论述义庄的概况、义庄和宗族的关系、创建背景和目的、社会功用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进一步探讨清中后期乡绅领导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乡绅的社会救济行为与宗族的关系,乡绅在社会救济及其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地位、作用。作者指出义庄的创建,在当时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绅的救济行为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而且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五)区域研究:周致远《明代的赈灾制度——以凤

阳府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以凤阳府为个案,论述了明代赈灾钱粮的来源、赈灾过程中的流弊及其防弊政策和赈灾的对象和目的。乌仁其其格《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社会救济事业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首先分析了清代呼和浩特灾民和贫民的状况,紧接着论述了清代在这一地区采取的诸如仓储制度、蠲免赋税、分配土地、建立养济院济生院等机构、赏赐、漏泽园以工代赈等一系列社会救济措施,指出这些政策的执行对防范和化解土默特蒙古的生存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当今社会的救济事业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历史启示。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根据救济主体的不同,指出在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存在着政府、宗族、民间慈善三种类型的救济,其中政府救济重在救灾备荒,宗族救济以济贫和助教为重点,民间慈善则以鳏寡孤独贫病者为中心,这三者各司其职,互相补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由于这些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从而使得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这是由市镇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吴滔《清代江南地区社区赈济发展简况》(《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对江南地区赈济行为的社区化倾向作了简要的梳理:清前期(顺治至乾隆中期),以社区为单位的赈济已经广泛存在,只是官方介入较多;从乾隆晚期至嘉道时期,随着国家荒政体系的逐渐衰败,社区赈济民间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由地方力量倡率的“小社区”的赈济活动不断兴起;咸丰以后,社区赈济向多元化发展,但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以城镇为单位的社区赈济活动替代了以都图、里甲、庄圩为单位的小型赈济。吴媛媛、何建木《晚清徽州社会救济体系初探——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以光绪三十四年徽州地区的水灾为个案,在结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次灾害后的救助工作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论述。文章首先结合受灾村庄的环境,以赈灾款额为资料揭示出灾情的空间分布,接着探讨了在晚清义赈兴起的大背景下,此次水灾的赈济过程和各赈灾机构的实际作用,并关注赈灾款项与赈济物资的来源与比例,从而揭示出在财政匮乏、政局动荡的晚清社会,民间组织捐助在赈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济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论述了在疫病灾害之下清代国家和社会的反应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指出清代江南的疫病治

疗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其内容反而更加丰富。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济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的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国家官府和社会的民间力量广泛合作,促进了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

(六)其他个案研究:杨剑利《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卯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以“丁卯奇荒”下的救灾过程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清政府荒政功能的衰退及其原因(财政匮乏、吏治腐败、仓储空虚),民间自发组织的义赈活动的兴起,从而理清了晚清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徐妍《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是对陈炽经济思想体系的再探讨,指出其经济思想大多是因灾荒而起,以救济民生为中心,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地瘠民贫、灾荒频仍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一系列人口的、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救治措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灾害的救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叶依能《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备荒救灾简论》(《中国农史》,1997年第4期)一文根据农书和地方志的材料有关材料,分析论述了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上备荒救灾的主要措施:选择种植抗逆性比较强的农作物品种,实行精耕细作和灾后补救补种等。这种农业生产技术上的备荒措施简单、易行、实用,投入少、效果好,在我国古代的防灾救灾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关于社会慈善事业的研究

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研究是近年来一个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既有总体上的概括,也有对特定时代、特定区域或具体慈善机构的分析研究。

(一)对慈善事业总体的论述: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在对比研究后发现: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

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进一步指出了晚清时期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为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否定了美国学者罗威廉和玛丽·兰金的观点。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学刊》,1999年)一文首先通过介绍戊戌运动时期经元善个人慈善思想的变化,来反映出这一时期慈善义理发展的新趋向,接着论述了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特点及其在当时社会的作用。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论述了晚清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慈善理念和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观念和实践两方面向近代的转型。

(二)慈幼事业:周荣《明清养济事业若干问题探析——以两湖地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一文以两湖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述了明清养济院的养济对象和名额、建置规模和养济事业的管理和运作实态。指出明清养济机构在收养对象和名额、建置和规模上的最基本的限制是受“现时财政”的制约,同时地方官的能力素质也与养济机构的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雷妮、王日根《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论述了宝庆府慈幼之政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的过程,同时指出地方官吏的倡导、投入,地方士绅及民众的响应佐助是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探讨宝庆府慈幼之政兴盛的社会文化机制中,作者重点讨论了社会风尚、传统儒、佛思想在促进慈善事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育婴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指出在同治、光绪年间江南地区育婴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乡村地区的经济实力较差,缺乏建立育婴堂的必要财力,但也设立了比较简单易行的接婴所和保婴局;其次对江南地区育婴事业的分布和育婴事业圈的特点进行了仔细分析,解释了育婴事业圈的生成机制,指出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育婴事业的兴盛共同促进了育婴事业圈的形成。汪毅夫《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在罗列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的发展渊源、因应的社会问题、早期的推展情况、官方的主导作用及其祀神、侨捐、贺钱、抄产等特殊事项进行了论述。谭志云、刘曼娜《清代湖南溺婴之俗与社会救济》(《船山

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代湖南百姓的贫困和当时社会上的厚嫁之俗是溺婴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面对这一现象,政府与社会从法律、舆论和育婴组织等各个方面予以救济,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但溺婴之俗身后隐藏的深刻社会原因使得这种社会救济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溺婴问题。肖倩《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从育婴组织的抚育对象和范围、抚育方式、抚育费用和名额、婴孩的去留四方面着手,详细论述了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的发展状况。而其与杨泽娟的另一篇文章《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经费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主要从育婴经费的来源和增殖、经费的管理者和管理方式、经费的发放几个方面考察了清代江西民间的育婴事业,指出经费的短缺是影响民间育婴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在把清代的育婴堂与中国历史上及国外同期的慈善机构相比的基础上,指出清代的育婴堂作为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在经营实态上具有行政管理制度规范化、经费筹措多样化、资金管理经营化、弃婴收养普遍化、弃婴保育职业化以及出路安排社会化等特点。

(三)区域特色的研究:刘瑞芳、郭文明《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直隶地区留养局和养济院在经费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论述,分析了清代慈善事业官倡绅办的特点,并透露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乡绅的地位的变化。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历史地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明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由官营向民营转移,从个别富人的义举发展到有组织的团体等特点,并以同善会为代表,对其建立的契机、具体运营过程、经费的来源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参与阶层广泛、活动经常及义庄盛行等方面。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兴盛的原因及其与商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作者还从另一个研究视角指出,江南地区慈善活动的兴盛也正是这一地区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表征。宫宝利《清代后期苏州地区公所的善举活动》(《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在利用苏州地区30家公所的碑刻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后期苏州地区公所的善举章程、实施情况及其公所办理善举的原因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熊秋良《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在

把各类慈善机构分类的同时,详细分析了其功能,并指出不同行业的慈善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呈现出许多的共性,如官督商办的管理模式、以官款资助、私人捐赠、以土养产、以息养业等筹资渠道等。清代湖南慈善事业的契约化、制度化特征,不仅是慈善事业管理方式上的进步,而且意味着城市市民社会新的发展,它缓解了社会的波动,促使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整个江南为范围,以苏州、杭州、上海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重点,详细论述了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创建意图、建置规模、经费筹措及其运营管理,说明了徽州商帮乃至所有商帮在清末仍保留着浓厚的地域观念和商帮色彩。

(四)其他个案研究:葛慧晔、王卫平《清代文化世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以苏州彭氏为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以苏州彭氏为个案,分析了彭氏家族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观动机。指出彭氏家族行善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既受儒、佛教中的生生思想、道家因果报应之说的影响,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同时国家的鼓励和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对彭氏家族的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夏明方《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丁卯奇荒”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西方对华赈济事业的分析论述,揭示其真正动因和造成的社会影响。但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我们都不能否认其救济事业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刘佳炜《从晚清民间慈善活动看市民社会的发育》(《学会》,2006年第8期)通过对当时民间慈善活动内容和特点的系统论述,提出了晚清市民社会发育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点。王卫平《明清时期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指出明清时期,国家、社会、宗族与家庭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在对残疾人的救助措施和政策方面指出以设立养济院为主;地方社会则以建立普济堂为主要形式,指出普济堂的出现与官方养济院的衰落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地方乡绅实力也比较强大,作者以江南地区的普济堂为重点,详细说明了普济堂设立的宗旨及其对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具体救助措施;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了起了重要的作用,明清

时期的宗族通过设置族田义庄来救济本族内的残疾人士,同时家庭作为基层社会的一个载体,在收养救助残疾者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黄艳《晚清省港民间慈善组织之比较》(《广东史志》,2000年第3期)一文对处于同一时期、同一经济圈内广州和香港两地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省港民间慈善组织在性质、社会活动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类似之处,而在各自兴起的背景、所起的社会功能及所包含的传统与近代因素等方面又有所不同。朱英的《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学刊》,1999年第11期)一文,首先通过介绍戊戌运动时期经元善个人慈善思想的变化,来反映出这一时期慈善义理发展的新趋向,接着论述了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特点及其在当时社会的作用,也指出这一时期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由于还处于初级阶段,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明清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颇多。除正史外,随着对各地方志、档案、宗谱的整理和利用,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区域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方式也逐渐脱离了过去单纯研究救济主体、救济方式的简单模式,开始向社会控制层面和社会流动层面等方向拓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区域社会救济史研究成果虽逐渐增多,但是呈不平衡性发展趋向比较严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江南地区,而北方地区的研究涉及较少,虽有一部分关于北方地区的研究,但大多是从宏观上研究,微观领域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少。

第二,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论著很多,但是大多都集中在清代一朝,且只集中于对慈善事业的研究,从纵向上看,对明代的慈善事业研究远远逊于清代。

第三,对明清时期救济事业的纵向比较研究以及与国外同时代救济事业的比较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第四,大多数研究都是对1937年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中局部或某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较单一,没有把救济史的研究与经济史、区域史、人口史、环境史进一步结合。